

習主席倡議構建「命運共同體」 打造互利共贏新亞洲

蔡德河 原全國政協委員



■蔡德河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博鰲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強調，「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不是中國「獨奏」，而是沿線國家「合唱」，「張開臂膀歡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舉」，全面闡述中國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新概念，推動亞洲和平發展的新思路。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摒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樹立雙贏共贏新理念，將促進地區共同發展，打造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新亞洲。世界各國欣然看到「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戰略逐漸落實，踴躍參與其中，殷切希望與中國深化合作，分享機遇，實現互惠共贏。

習近平指出：「『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我們歡迎沿線國家和亞洲國家積極參與，也張開臂膀歡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舉。」習近平還強調，在前進的道路上，中國堅持和平發展，決心不會動搖；堅持共同發展，理念不會動搖；堅持亞太合作發展，政策不會動搖。這「三個不動搖」充分展現出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為促進亞洲和世界發展勇挑重擔、開拓進取的信心與決心，也展現出中國維護亞洲和世界安全穩定，推動可持續和平發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中國積極倡導和全力推動下，亞洲各國增進互信，加強團結，深化合作，一定能夠創造更加繁榮與美好的新未來。

中國期待和世界分享發展成就

習近平還介紹了中國發展情況，全面展現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良好態勢。與此同時，習近平還介紹了中國積極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亞投行、絲路基金以及一批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的籌建情況，既展現出其中蘊含的巨大發展空間，同時也展現出中國積極、開放、包容、長遠的發展觀。中國經濟體量大、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以現在每年7%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其增量就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經濟總量。未來5年，中國進口商品將超過10萬億美元，對外投資將超過5000億美元，出境旅遊人數將超過5億人次。這些都會給亞洲國

家帶來實惠。

亞洲在當前世界局勢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經驗可以成為周邊國家發展模範，建立適合亞洲特點的投資銀行，將給世界帶來長遠影響。目前已有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參與「一帶一路」表示積極態度；近日隨著俄羅斯、巴西、荷蘭、格魯吉亞、澳洲、埃及等國先後宣佈申請加入亞投行，令亞投行意向成員國至3月30日增至43個。各國踴躍參與「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是對中國經濟增長、實力增強的認可，也是對中國的信任，各國不但在經濟上加強互聯互通，也增加政治上的互信。打造「亞洲命運共同體」，反映出中國期待與亞洲乃至全球各國分享發展成就，是真正的大國之舉。

實現亞洲長久穩定和平發展

加強經濟合作，實現亞洲經濟穩定發展的同時，中國還提出新的安全觀，即實現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要摒棄冷戰思維，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此外，中國還積極倡導

堅持不同文明兼容並蓄、交流互鑒，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樑、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

可見，習近平提出建設「亞洲命運共同體」，不僅包括更加緊密的經濟合作，同時也包括可持續穩定發展、面向未來的新安全觀、新文明觀，致力於從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打造亞洲命運共同體，從而實現亞洲長久、穩定的和平發展。

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博鰲論壇行前表示，此行會與內地有關部門跟進亞投行籌組情況，及探討香港作為主要金融中心所發揮的作用。香港加入亞投行，並充分利用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既可發揮香港金融產業優勢，提升金融中心功能和地位，獲得未來經濟發展的更大動力，也可以為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作出貢獻，意義重大。港府應積極與國家有關部門溝通，促成其事，在國家的大戰略中找準、用好自身的角色和優勢。

李光耀是戰略家

宋小莊

筆者希望看到對李光耀的「戰略家」的評價，卻沒有見到。直到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上的講話，才看到這個評價。這說明國家領導人不但視李光耀為政治家，而且視他為戰略家。李光耀當然是政治家、是歷史巨人、是傑出的國家領袖、是優秀的外交家，但他對新加坡的貢獻、對亞洲的貢獻、對世界的貢獻，卻是他對新加坡戰略定位的思維、對亞洲和世界和平發展的戰略思維。

在李光耀病逝後，世界各國、各地政要的唁電、訃聞、悼詞，幾乎沒有不讚賞的，他受到新加坡民眾的廣泛愛戴和敬重，也是世界各國政要中罕見的。只是媒體的評介不一，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不是大國，在亞洲四小龍中，只是一條小龍。一個小國領袖，具有這種識見，扮演如此角色，起那樣重要作用，李光耀作為戰略家，當之無愧。

新加坡的借鑒戰略青出於藍

與不少新興國家的獨立源於國際潮流、出於民族意願不同，1965年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邦、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卻是被迫的。人民行動黨未能與馬來亞巫統在涉及國內民族和種族政治利益的問題上妥協，是歷史學家值得研究的課題。然而，沒有資源、沒有水源、沒有國防、缺乏土地，新獨立的新加坡隨時可能夭折。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選擇了賴以維生的外交政策。當年兩個月內，新加坡就加入了聯合國，並成為英聯邦（國協）的成員。在兩年之內，新加坡又參與組建了東盟。早在1976年李光耀已經訪京，見到毛澤東，但為了避免有關國家的忌諱，新加坡與中國建交，卻是東盟主要國家中最晚的。一急一緩，體現了李光耀的外交戰略。

新加坡是羨慕香港的，香港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自由港的優勢。新加坡背靠東盟、面向國際的優勢，卻是自己努力打造的。與獨立前作為地方自治區域不同，新加坡獨立後是靠借鑒戰略起家的。世界上的大國，出於本國發展的需要，除了建立創新戰略之外，還會形成借鑒戰略，中國、日本都有這樣的戰略。但在小國之中，有借鑒戰略的，實在不多。在數十年中，新加坡的借鑒戰略，不但沒有改變，而且更為殷切，在世界各國中，罕見其匹。香港回歸後，國家領導人經常說香港要向新加坡學習。香港可以從新加坡學習的東西的確很多，但學回來的實在太少，香港本身就沒有借鑒政策，更不用說戰略了。相反，新加坡從香港借鑒的東西實在太多，而且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新加坡並非人才濟濟。亞洲四小龍崛起之時，新加坡的各方面幾乎沒有不向香港取經的。只不過新加坡向香港學習時，帶有強烈的自主意識，絕不生搬硬套，而是有所取捨，有所變革，轉化為適合新加坡的東西了。香港的房屋出現問題時，人們總會提到新加坡的組屋。其實，新加坡的組屋是借鑒香港公屋的產物。

香港的公屋是廉租屋，是緩解社會矛盾、解決底層人士房屋需求的直接措施，是從社會福利政策出發的，如此而已。

但到了新加坡手裡，成了廉價屋，賦予了豐富的政治、經濟、公共社會政策和長遠發展策略等方面的內涵。新加坡組屋和私屋的比重為八比二，私屋價格的升跌對整體社會穩定影響甚微，反而給政府大規模的填海造地提供了民意基礎，大部分民眾安居樂業，效忠國家，組屋成為新加坡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對新加坡而言，房屋問題是化腐朽為神奇的機遇。對香港而言，由於公屋、私屋各佔一半，房屋卻成為政府的負擔，多了不行，少了不幸；漲價是麻煩，跌價是災難。不管怎麼樣，都是難題，皆遭物議。

土地開發戰略，對新加坡至關重要。原來面積只有580平方公里、現有人口五百餘萬的新加坡，竟然填出近150平方公里土地。但新加坡並不滿足，在蘇州有工業園，在別的地方還有。香港面積近1,100平方公里，過半土地屬於郊野公園，但香港可開發的土地，按人口計算，不如新加坡。回歸以來，香港幾乎沒有大規模的土地開發，沒有建立土地儲備。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4年新加坡GDP排世界第37，人均GDP排世界第8。人口只有香港七成的新加坡，把香港拋離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土地戰略，以及與該戰略配套的產業戰略。

與香港一樣，新加坡缺乏勞工，尤其是建築勞工。但《雙城記》裡記載的解決方法卻截然不同，新加坡引進外勞，以降低成本，解決本地工人擔心的就業和待遇問題，並處理外勞待遇引發的糾紛。香港卻因為擔心本地工人的不滿，擔心引進外勞觸發糾紛，寧可成本攀升，也不敢引進外勞。由於應對的不同，《雙城記》故事裡的結局，大概會有顯著的差異。兩者的對比，恐怕難免應了《孟子·告子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名言。

李光耀成為兩岸的老朋友

像新加坡這樣缺乏腹地、缺乏空域、缺乏台灣的地方，是很難建立自己的軍隊和國防的。就算要建立，也會引起周邊國家的猜忌。雖然當年願意協助的國家和地區不少，包括以色列和埃及，但新加坡卻選擇了台灣，沒有發生選擇埃及或以色列可能在東盟國家引發的麻煩。所謂「漢光計劃」也沒有使新加坡成為兩岸任一方的敵人，李光耀反而成為兩岸雙方的老朋友，第一次汪辜會議是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港回歸後，內地不少官員在新加坡接受培訓。據說，美國重返亞洲、進行戰略再平衡是李光耀提議的，這間接觸動南海、東海的爭端，但這也促成中國「一帶一路」決策的形成，而對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新加坡認為，這是亞洲包括新加坡發展的機遇。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有比新加坡更優越的發展條件。香港可以從新加坡學些什麼呢？主要就是學習李光耀的戰略思維，把「一國兩制」這一項重大的戰略構想在實踐中發揮出來。

堅持依法治港推進民主保繁榮穩定

沈家榮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座談會日前在北京舉行。與會者就香港基本法歷史和現實意義及如何全面準確貫徹基本法等方面展開座談。今年全國兩會，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港澳部分提出，「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不僅要求香港配合國家依法治國，更對香港推行政改必須遵循憲法和基本法提出要求。香港正處於政改關鍵期，依法辦事是推動政改的大前提。但是，少數反對派採取挑戰法治底線的極端行為，肆意阻礙普選。廣大市民須堅決擁護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持在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下，推進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堅決抵制任何「港獨」言行，支持特區政府嚴懲違法禍港行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促進人心回歸。

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國的治國方針，成為兩會最主要核心內容之一。依法治國對鞏固國民向心力，穩定社會和經濟秩序，提升執政能力和國民認同，促使整體經濟持續良性轉型，均起到正面效應。大氣候決定小氣候，在依法治國的大方針下，依法治港成為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在北京會見出席亞太經合峰會的特首梁振英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強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依法保護港澳同胞利益。這是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邁出的重要一步，對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促進香港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習主席的講話清楚表明，「一國兩制」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要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不能缺少依法治港這個有機組成部分，必須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在港實踐。而依法治港的關鍵，就是正確處理「一國」和「兩制」的關

係，堅持以尊重憲法和基本法為依據。

落實普選關鍵是依憲依法辦事

當前，港人最關心的問題是希望政改方案能夠順利通過，香港的民主政制向前邁出重要一步。要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關鍵是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而行。但是，反對派偏偏背道而馳，不斷衝擊香港的法治基石——憲法和基本法，做盡破壞普選之事。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聯署聲明反對人大「8·31決定」，要綑綁否決政改方案，衝擊「一國兩制」下中央在本港政制問題的憲制地位；強推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方案，企圖架空基本法明文規定的提委會提名普選特首候選人的權力。在立法會內，反對派議員濫用權力，展開「拉布」和「不合作運動」，癱瘓立法會和政府施政，阻礙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在社會上，不斷煽動暴力違法的「嗚鳴」、「光復行動」、「反水客」行動等，極力破壞社會秩序，挑撥香港和內地民眾的矛盾，鼓吹變相「港獨」。違法亂港的現象層出不窮，變本加厲，其背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拋開憲法、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約束，搶奪特首

普選的主導權，把香港變成完全自治的政治實體。

香港的權力來自中央，「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是根據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不是「隨意的自治」。實現普選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解釋及決定，除此之外，任何按照「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不僅不能給香港帶來民主進步、安定繁榮，反會導致政爭不休，威脅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特首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香港的民主必須是法治下的民主；在追求民主的同時應依法守法，否則便會淪為無政府主義。去年「佔中」事件的正反教訓也證明，法治始終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未來依法治港更需要進一步強化。

依法嚴懲違法亂港搞事者

回歸17年有多，堅決按照法律辦事，是持續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民主發展的重要保證。本港有人公然踐踏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挑戰「一國兩制」底線，挑撥兩地矛盾，鼓吹「港獨」，這是違憲違法，違背包括700萬港人在內的13億中國人民的意願。對於刻意破壞法治，對香港和國家發展造成惡劣影響的言行，香港絕不能容忍姑息，社會各界必須發出正義的聲音，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制裁搞事者，防止違法亂港的行為氾濫，衝擊「一國兩制」，損害繁榮穩定。



■沈家榮

桂松

近年社會爭拗頻仍，尤以政制問題為甚。教育似乎退避三舍，不大「搶眼」。

中央領導以及港澳辦負責人均特別指出，香港特區應做好青年工作。這就要求我們的教育工作要跟上去，並有所創新。

香港九七回歸後，教育是有進步的。最明顯是學制改革——實行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的完整制度，擺脫了英聯邦舊學制的羈絆，與世界主流學制接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突破。此外，考試制度亦作出果斷的更改，廢除了小學的學能測驗，變中學會考為中學文憑試，減少了考試對師生的束縛。與此同時，課程亦作出相應的更



■香港學生在上中國歷史課。

改。這些變革，對香港教育今後的發展無疑有深遠的影響。

憑藉這種有利條件，教育理應在新的台階上大展拳腳。可惜由於種種原因，出現了新的阻力，使近年的教育陷於停滯狀態。

先是教育局遷就部分社會人士的需要，以教學語言微調的方式，實際上取代了實行多年並證明行之有效的母語教學，既妨礙教學質素的提高，又不利於中國文化在校園的傳播，徒令重英輕中之風更盛。繼而在教育圈中出現補習、補課熱，許多學生在課餘或假期內需要加碼進修，業內流傳的競爭口號是「贏在起跑線上」，這條線一直延伸到幼兒教育，由此引起兩種不良後果，一是師生教與學的負擔更重，壓力更大；一是全人教育受到衝擊。前者導致師生健康受損，最近的一些問卷調查顯示，高中學生出現抑鬱傾向者達四成多。後者使「教書不教人」的弊端更為嚴重。有些學生讀書十多年，對國家的基本認識亦付闕如，這種現象在「佔中」前後的種種出格行為中，表露無遺。

從教育專業角度上看，應

將這個問題提升到教育方向上加以審度。十多年來，雖然經過教育改革，學生的學業水平有所提高，「尖子學生」在國際學術比賽中又屢屢獲獎，是否證明香港教育已達國際水平，方向完全正確？

學業水平是衡量教育質素的基本準則，卻不是唯一準則。除非我們摒棄全人教育，否則就應以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作為衡量準則。這關乎辦學是否堅持全人教育這個國際公認的教育理念，亦即教育方向。理論上沒有人反對它，實踐上能真正貫徹者則又幾何？這正是每一位辦學者和教育工作者需要認真重視的問題。

教育局是管理教育的最高決策機構，務必在全港各校貫徹落實，這關乎人才培養的優劣，關乎青年工作的成效。任重道遠，社會寄予厚望。

當前要突破的就是德育。這又是老生常談。正因德育只局限於「談」，而非著眼於「行」，才變為老生常談。我們應該承認，目前學校推行德育，日趨薄弱。究其原因，就是教育方向有偏差，若聽之任之，難以培養出德才兼備、愛國愛港的良才。

「佔中」行動對社會敲起了警鐘，在重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同時，一刻也不要忽視教育。具有遠見卓識之士，特別是政府領導人，對此應有充分的考量。